

# 以“中国式快闪”构建新时代青年 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

■ 王维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中国式快闪”契合了当代青年的身心特点、社交偏好、行动逻辑、话语体系和文化需求,成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和新兴形式。“中国式快闪”从主体性凸显、应用场景拓展和育人效能提升等方面给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变化。因应这些变化,应坚持“中国式快闪”的价值导向和责任担当,在变与不变中守正创新,从目标、供给、制度等角度进行积极探索,用“快闪”的中国方案推动其中国实践的良性发展,不断增强广大青年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青年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式快闪” 守正创新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1.012

“快闪”正式出场于 21 世纪初的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是指一种由素不相识的人们通过网络达成共同约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指定时空实施,引起广泛关注后迅速离开的行为艺术。作为 21 世纪都市时尚文化的重要代表,得益于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快闪”迅速蔓延至全球。作为舶来品的“快闪”于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经历了从自发性到组织性、从娱乐性到宣传性、从旁观性到参与性的本土化改造后,借助网络短视频的流行,直到最近几年才风靡开来。尤其是始于 2018 年国庆节一直延续到 2019 年的、由央视发起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成为“中国式快闪”蓬勃发展并形成鲜明气派风格的最好印证和集中体现。青年群体最为活跃、最有生气、最具创造性,“快闪”的线上线下链接、时间空间聚合、形式动感时尚、参与便捷简单等特征,深刻契合了青年群体的身心特点、社交偏好、行动逻辑、话语体系和文化需要,成为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当前,切实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应高度重视、积极利用“快闪”这一新兴形式,着眼于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以铸牢理想信念、铸塑价值共识、铸就精神家园为旨归,结合新时代新青年的新变化、新使命,准确识变、合理应变、主动求变,用有中国底蕴、中国价值、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推动“快闪”的中国实践,实现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收稿日期:2020-11-12

作者简介:王维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道德与青年思想理论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在防范化解高校重大风险中的作用研究”(课题编号:20BKS1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一、“中国式快闪”给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群体,青年总是鲜明地表现出正在发育成长中的自然人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人的两种特点。”<sup>[1]</sup>青年群体的上述特点使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未来性。推动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自我,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支撑。“中国式快闪”在经历了主流化改造、本土化移植与创新性发展后,不仅具有了更积极、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给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更多的新气象、新变化。应深入剖析、积极因应这些新变化,激发主体活力,拓展应用场景,提升育人效能,实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 (一) 人的主体性是“中国式快闪”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

“中国式快闪”之所以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归根结底,这一契合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之上。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人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特性”<sup>[2]</sup>。在“中国式快闪”中,青年是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推动者与承担者,人的主体性是其实施的内在依据。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也要通过人的主体性,其核心要义是激发并彰显人的主体性。因此,人的主体性是“快闪”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的基础。

“中国式快闪”的实施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过程。一是“快闪”的青年主体地位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3]</sup>对于“中国式快闪”而言,青年是其实施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在“快闪”的实施过程中凸显人的主体性,一是让青年做“快闪”活动的主人、当“快闪”实施的主角,充分调动他们自我展示、自我教育、自我实现的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快闪”的创新精神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习近平强调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sup>[4]</sup>。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快闪”艺术,总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其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探索和文化产品的创新。“快闪”在中国近20年的实践证明:正是青年群体敢为天下先的探索激情与创新活力,才使“快闪”实现了从自发性到组织性、从娱乐性到宣传性、从旁观性到参与性的中国式转化,并在与时代同行中不断丰富发展其主题、内容、形式、载体与形态等。三是“快闪”的社会意义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快闪”不是孤立个人意志的体现,它总是与一定的历史积淀、国家意志、社会文化及话语体系相联系,从而拥有了社会意义。“快闪”的社会意义要求“快闪”在实施过程中应切实发挥人的主体性,追求表现自我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强调个性释放和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实现吸引眼球对于社会意义的自觉服从。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在“中国式快闪”中得到充分彰显。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输入与输出的统一来彰显主体性。当“快闪”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形式介入青年群体时,青年作为客体参与“快闪”,自主接受“快闪”带给自身的影响,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输入。与此同时,青年作为“快闪”的参与主体,也能够给其他参与者施加影响,并且通过“快闪”的广泛快速传播影响更多的群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输出。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身份角色的转化,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输入与输出的统一。二是通过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来彰显主体性。青年群体参与“快闪”的过程,实质上是对思想与行为二者辩证关系的实践。青年群体在参与“快闪”之前,会以原有的思想来支配其行为,通过参与“快闪”,引导思想的优化甚至转变,进而更好地指导行为,实现思想与行为的良性循环。并在良性循环之中,使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得到自然发挥。三是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来彰显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5]</sup>。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必须实现个人与社会、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双向互动。青年在参与“快闪”前,可以结合自身的爱好特长、性格特点来选择参与什么样的“快闪”,以何种身份、何种形式参与“快闪”。但与此同时,青年也必然要考虑到参与“快闪”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及目的。可见,“快闪”这一形式既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特殊性,也应符合社会的普遍要求,让青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发挥主体性。

## (二)“中国式快闪”实现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场景的新拓展

实现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上的集中布局。“快闪”的便捷化使其可以在任何空间进行,看似随意分散,但是若能利用好这一特点,将其在空间层面进行系统整合、规划组织,并有计划地密集推进,就可以更好地吸引青年参与和有效传播,从而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一是在公共空间进行集中布局。从微观上看,“中国式快闪”一般选择在人流相对密集的公共空间进行集中布局、集中展示。应该说,“快闪”的行为特征和活动魅力使其在任何空间都足以吸引公众的眼球。然而,“快闪”因选取场所的不同,其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和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快闪”在具体的活动地点选择时,常常考虑广场、校园、旅游景区等人流相对密集、能最大限度吸引公众眼球的公共空间。二是同一主题的区域协作。针对同一主题,“快闪”常常在充分考虑地方语言、接受习惯、文化特色等因素基础上,选择不同地域的地标性建筑或代表性地点,实现了空间上的大范围布局。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为例,其先后在北京前门地区和首都国际机场、深圳北站、厦门鼓浪屿、成都宽窄巷、武汉黄鹤楼、长沙橘子洲头等地举办,上述地点均集中体现了所在城市的文化底蕴、文化特色与文化品格。“快闪”通过联结、会集各地最具情怀的文化标识,在表达同一主题的同时凸显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了“快闪”活动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实现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上的连续展现。传统“快闪”在实施频次上往往是单次的,活动范围小、影响也有限。现在的“快闪”活动,从一开始就精准聚焦电视观众、网民等庞大受众,非常注重“二次”乃至“N次”的密集展现与连续展现。这样一来,受教育者便能在同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系统、多方位地连续接触到教育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再辅之以恰当的内容与形式,便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仍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为例,2018年国庆节,北京前门大街数千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由此拉开了这一“快闪”活动的帷幕。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央视选择元旦、春节、全国两会等重要时间点,陆续、密集推出了30期《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形成接续不断的“快闪”模式。这一“快闪”活动所形成的强大示范效应,带动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群众的自发组织、积极参与和连续开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参与感。

实现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上的全员推进。与国外“快闪”活动多为个体发起不同,“中国式快闪”通常由特定单位、机构或公司组织,经过精心筹划和周密排练,有时还邀请公众共同参与。从而以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集聚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其不仅有了更高的艺术水准与欣赏价值,而且更“致力于弘扬主旋律与正能量,加入了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宣传,对道德理想的激励,对文化传统的继承要求”<sup>[6]</sup>,由此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同时,“快闪”线上线下链接、时间空间聚合、形式动感时尚、参与便捷简单,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对于参与者几乎没有准入要求,任何人既可以作为组织者组织“快闪”,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参与“快闪”。只要制定好“快闪”的“规定动作”,便能够根据不同类别青年的特点,找寻与其相匹配、相适应的“快闪”活动。青年本身也可以作为活动主体,发起、组织符合自身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的“快闪”。从而能够充分调动所有主体的积极性,集思广益,提供信息化时代青年群体所追求的思想

想厚度、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实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

### (三)“中国式快闪”提升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能

纵使“快闪”把具有“在场性”“真实性”的线下情境创设作为活动的第一要义,但线下活动的辐射范围只能局限于特定的公共空间与有限的参与人数。“快闪”活动如何突破空间的限制实现更广且持续的传播,新媒体技术的加入显得尤为重要。新媒体作为“快闪”的主要传播载体,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方式多样、虚实共情等特点能够极大提升“快闪”的传播效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大范围的传播和最为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国式快闪”的传播速度提升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新媒体的即时性能够使“快闪”在第一时间进行传播,传播过程包括信息传播和内容传播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起组织期间的信息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起组织者需要将“快闪”的相关信息及时送达至潜在受众,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这一特性能够让“快闪”在最短时间内集结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织策划,实现“快闪”发起组织阶段的时效性。第二个阶段是“快闪”活动完成后的内容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时效性相对于信息传播阶段的时效性显得更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有效性。而新媒体手段能够让“快闪”内容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送至潜在的思想教育受众之中,使其能够即时获取“快闪”活动所希望传达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确保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及时入心入脑。

“中国式快闪”的传播范围提升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自媒体、融媒体的迅猛发展,让大众传媒在传播空间上实现了质变。借助这一特点,“快闪”也能够实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传播端口看,“快闪”可以通过新媒体在手机、电脑、电视等多个端口同时进行传播,进而丰富青年群体的各种信息获取来源,以此扩大传播覆盖面;从传播平台看,无论是广播电视节目,还是微信、微博等手机电脑平台,“快闪”同样能够实现集中上线、推送、播出,进而满足青年群体不同的平台使用爱好与习惯。通过传播端口和传播平台的全覆盖,“快闪”便可以在尽可能广的范围进行传播,确保尽可能多的受众最大限度地获取相关内容,由此实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的扩大和延伸。

“中国式快闪”的传播方式提升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新媒体给传播方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质变,更多的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让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由最开始的口耳相传发展到电视、手机、电脑等多渠道传递,再到现在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这一传播方式的质变让“快闪”足以实现立体式、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受众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获取“快闪”的相关内容和信息,多角度、多形式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基于当前新媒体交互模式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哪怕是未能到现场的受众也能通过评论、发“弹幕”等多种方式参与“快闪”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其参与感、获得感大大提升。

## 二、“中国式快闪”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导向与责任担当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快闪”在给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变化的同时,其自身的内涵、形态、载体等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上述变化中,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有一个要求始终没有变化,那就是始终坚守“中国式快闪”的价值导向、责任担当。

### (一)始终坚守“中国式快闪”的价值导向

在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否得到广泛传播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必须着眼于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积极防范化解“中国式快闪”可能存在的过度娱乐化、价值中立化及意识形态风险,始终坚守“中国式快闪”的价值导向,积极推进情感能量的共鸣与凝聚、主流价值的认同和升华。

以正确价值导向防范“快闪”的过度娱乐化。“快闪”流行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实质,是“青年群体社会交往活动的缺失、调节心理压力的需要、重塑社会秩序的内心冲动以及自我表达的诉求”<sup>[7]</sup>。作为社会交往的新兴平台,“快闪”解决了青年群体存在的上述问题,满足了青年的精神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在满足青年精神需求的过程中,“快闪”给他们带来的应该是精神的力量。“快闪”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受众,以新媒体为主要介体,很容易为了迎合青年群体、吸引流量、扩大影响等,采用哗众取宠、肤浅夸张的表现形式,传达毫无营养、纯粹娱乐的内容,朝着过度娱乐化方向发展。为此,一方面,应深刻认识到,寓教于乐不等同于泛娱乐化。“快闪”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特别是涉及革命先烈、历史事实等,必须严肃对待,以合适、合理的方式来开展。另一方面,应切实形成底线思维,通俗易懂不等同于文化底蕴缺失。为了尽可能扩大受众的覆盖面,“快闪”需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青年群体传达相关内容,但是一定不能陷入唯流量、唯通俗的困境,造成文化底蕴的流失与缺失。

以正确价值导向防范“快闪”的“价值中立”化。“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快闪在早期的发展中呈现出虚无、随性、荒诞的文化表征和心理状态,间接投射出西方社会的现实图景。”<sup>[8]</sup>这种虚无、随性、荒诞,本质上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以纯粹娱乐、意义空场来看待“快闪”,认为“快闪”是纯搞笑或膜拜纪念的嬉皮行为,与正与邪、美与丑、善与恶等价值问题全然无涉。“快闪”的“价值中立”在理论上是不可靠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从理论上讲,“快闪”的“价值中立”化是消费主义在文化生产领域的投射,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体现。实际上不承载任何价值与意义的“快闪”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娱乐性的“快闪”活动,也在极力向参与者传达着本活动由参与者支配、供参与者享用的价值隐喻。从“快闪”的具体实践来看,“快闪”的实施过程时刻面临着包括“快闪”理念、“快闪”目的、“快闪”方式、“快闪”手段、“快闪”载体及“快闪”形态等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因此,完全的价值中立在“快闪”中是根本做不到而且是有害的。如果“快闪”过分倚重各类娱乐化手段,过分强调价值的无涉,最终有可能成为娱乐的俘虏,从而造成价值的空场,甚至产生与价值的背离。

以正确价值导向防范“快闪”背后的意识形态风险。且不说“快闪”这一活动形式从西方舶来,其背后携带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元素,带来了极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单从“快闪”参与主体多元化、传播速度快这些方面看,便可能带来潜在的意识形态隐患。就参与主体而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参与任何一个“快闪”的任意环节。这就意味着,如果监管不到位,任何势力都可能通过或明或暗的形式介入到“快闪”的发起、组织、开展与传播中。其意识形态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各类社会思潮、意识形态也都能通过“快闪”,在最短时间内传达到最广泛的目标人群,这给心怀叵测之人迅速达到其目的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此,面对“快闪”带来的新变化,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与管理权,深刻认识到,当“快闪”来到中国,其发展就必然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青年的实际需求;深刻认识到,允许“快闪”以多种形式展现多种内容,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必须有旗帜鲜明的价值导向。

## (二) 始终坚守“中国式快闪”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sup>[9]</sup>。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sup>[10]</sup>。就“快闪”而言,在满足青年群体文化需求的同时,必须将增强青年群体的精神力量作为核心任务、时代责任与使命担当,促使广大青年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在一起。

以“中国式快闪”增强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sup>[11]</sup>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因此,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快闪”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是增强青年群体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必须把筑牢理想信念作为“快闪”实施的重要要求,充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融入“快闪”的全过程。始终做到立足当前,通过“快闪”引导青年群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共识、力量;始终做到放眼未来,引导青年群体在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中,坚定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毅力与勇气。总而言之,无论是引导青年群体坚定共同理想,还是坚定远大理想,都可以借助“快闪”让广大青年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不断领悟、认同和践行。

以“中国式快闪”增强青年群体的价值理念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而言,核心价值观都是这个国家与社会的黏合剂与连心桥,意义十分重要。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今天,“快闪”实施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多元社会思潮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价值引领。“快闪”作为一种主要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的文化活动,必须旗帜鲜明地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坚持不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快闪”可以为了满足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以其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方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手段来开展,但决不能为了一味地满足青年的感官需求,而陷入过度娱乐化和价值中立的困境。这不仅不能给予青年群体正确的价值导向,反而会让其因自身认知能力不足而陷入精神迷茫,甚至形成错误的价值理念。因此,“快闪”的开展必须将铸塑价值共识作为重要任务,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快闪”始终,通过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理念明确“快闪”的价值目标,通过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理念引导“快闪”的价值选择,通过个体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理念规范“快闪”行为的价值取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快闪”的主旋律,切实增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力量。

以“中国式快闪”增强青年群体的道德观念力量。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道德是一个国家社会风尚好坏、文明程度高低的风向标和测量仪。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公民道德在实现公众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各种各样具体的活动抓手、有效载体,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式快闪”。面对当前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通过开展人与国家关系领域的“快闪”活动,杜绝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现象,增强公众的家国情怀;通过开展人与人关系领域的“快闪”活动,解决人际关系利己化、冷漠化、冲突化等问题,增强人际和谐;通过开展人与社会关系领域的“快闪”活动,解决公共规则意识、公共财产意识、公共安全意识、公共文明意识、公共参与意识淡漠的问题,加强公众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通过开展人与生态关系领域的“快闪”活动,解决漠视公共卫生、污染公共环境、生态责任缺失等问题,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开展人与网络关系领域的“快闪”活动,解决网络善恶观念模糊、道德情感冷漠、诚信度较差等问题,凝聚网络正能量。总之,以“快闪”活动助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解决,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走向新高度。

### 三、构建“中国式快闪”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的途径

因应“中国式快闪”从主体性凸显、应用场景拓展和育人效能提升等方面给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变化,应坚持在变与不变中守正创新,从目标向度、供给向度、制度向度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用“快闪”的中国方案引领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不断增强青年的精神力量。

#### (一) 铸魂育人是“中国式快闪”的落脚点

“中国式快闪”必须回答铸什么魂、育什么人这一首要性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教育要把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时代新人作为最为核心的任务。“中国式快闪”具备了时尚化、潮流化、个性化及便捷化等因素,是网络时代为青年群体所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同时,“中国式快闪”也是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形式,其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导向仍然且必须归于通过鲜明化的主题、生活化的内容、综合化的形式与网络化的载体,将广大青年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国式快闪”必须回答如何铸魂育人这一方法性问题。“中国式快闪”诞生于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大浪潮,必须把握好这一时代机遇,积极探索“中国式快闪”铸魂育人的新方式、新方法,实现全方位关注、全主体参与和全工具运用。特别是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一传播介质,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大范围、多角度、多渠道组织、策划,开展一系列以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为目的的“中国式快闪”活动,切实提升活动的质量和效果。铸魂育人根本上要靠人,“快闪”的特点决定了其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在诸多参与主体之中,党团组织是“中国式快闪”的领航人,发挥着引领方向、举旗亮剑、抢占阵地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让其以发起者、组织者、传播者的身份参与“中国式快闪”的全过程,实现其由被动到主动、由受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转变,成为抢占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主力军。

“中国式快闪”必须回答为谁铸魂育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式快闪”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国式快闪”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从微观上来讲,是着眼于新时代我国青年群体的正向发展;从宏观上讲,青年如何发展直接关系着“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中国式快闪”所培养的新时代青年,不仅是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的青年,更是能够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结合起来的青年,要激励广大青年以智慧担当和青年力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二) 推进“中国式快闪”形式、内容与形态的创新

推进“中国式快闪”形式上的改革创新。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sup>[12]</sup>。“中国式快闪”以新媒体作为主要介质,在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优势十分明显,既能打破时空的限制,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在手机、电脑、电视等多个终端的多个平台上进行及时、广泛且规模化的传播,也能够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目标受众,将“中国式快闪”推广至青年群体。但是,将“中国式快闪”精准“送到”青年群体仅仅实现了“立体式、全方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要想实现“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得“送入”青年群体,这需要通过形式上的改革创新来实现。应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力、创造力,让青年群体成为“中国式快闪”形式的主要创造者,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多元化的“中国式快闪”方案,满足不同性格特点、兴趣爱好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实现“中国式快闪”从“送到”到“送入”的第一次飞跃。

推进“中国式快闪”内容上的改革创新。“中国式快闪”形式上的改革创新实现了从“送到”到“送入”的质变,而要实现从“送入”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第二次飞跃,则需要在内容上进行改革创新。“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sup>[13]</sup>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中国式快闪”内容上的改革创新亦然:一是坚持内容供给的需求导向与价值引领相统一。不仅要全面把握、关照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更要契合民族、国家、社会对于青年群体的发展要求,在实现个体需求与国家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求导向与价值引领的关系,既符合青年群体文化需求,又符合国家价值引领需要。二是坚持内容供给的时尚潮流与社会公益相结合。不仅要契合时尚潮流,更应结合时代发展的大背景,通过与社区建设、守护蓝天、垃圾分类、防控艾滋病、大型赛会服务等社会公益与主题宣传的联姻,传播积极生活态度,传递思想与价值的力量,赋予“中国式快闪”以时代意义,让时尚化、潮流化的“中国式快闪”有用武之地。

推进“中国式快闪”形态上的改革创新。一般而言,可将“中国式快闪”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形态。官方形态是指由广义上的官方部门、官方机构、官方媒体等生产的“快闪”产品;民间形态是指由政府之外的民间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生产的“快闪”产品。推进“中国式快闪”形态的改革创新,应正确处理好官方形态与民间形态的关系。一方面,就目前状况看,官方形态是“中国式快闪”供给的主导产品,一般而言,由于官方组织的权威性和占有资源的充沛性,官方形态的“中国式快闪”普遍具有较高的质量,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反映青年的文化需求,反映思想、艺术和技术融合的“快闪”文化发展趋势,但也面临着不能完全满足青年对“快闪”文化产品特殊性、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国式快闪”的民间形态具有多样性、差异化、个性化的供给特点,但由于监管不到位和自身文化生产力量薄弱等原因,也存在着活动质量参差不齐、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可以说,官方形态和民间形态各有优劣,这就要求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积极探索党团领航、民间参与、各主体协同配合的供给模式,拓宽“中国式快闪”产品高质量供给的覆盖面。

### (三) 加强“中国式快闪”的监测监管

从线上和线下两个层面完善“中国式快闪”监管机制。作为线上发起、线下开展的文化活动,“中国式快闪”的监测机制需要从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来完善。对于线上而言,主要是要集中力量加大内容审查力度。“快闪”在线上主要进行的是发起、组织和传播,如若对活动发起、组织等使用登记、报备等传统监管手段,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而且会影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应以内容审查为重点,在发起组织阶段避免会带来负面影响“快闪”活动的组织,在传播阶段严禁可能产生消极效应的“快闪”的传播。对于线下而言,主要就是要建立完善应急反应机制。“快闪”在线下主要是活动的开展。“快闪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因其行为上的群体性、组织上的无序性以及潜意识中的情绪宣泄性,使得其向群体性事件转化成为可能。”<sup>[14]</sup>因此,应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保证“快闪”的正常开展,防止其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同时,切实提高应急处理能力,一旦“快闪”的开展出现问题,要有足够的能力在第一时间处理和有效制止。

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中国式快闪”的监测预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让廉价的笑声、

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sup>[15]</sup>。对于“快闪”而言,更不能让文化消费主义、生活颓废主义等有害“快闪”文化影响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为此,应建立起政府与微信、微博、抖音等各大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协同监测机制,通过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中国式快闪”进行监测和预判,进而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隐患解决在前端。同时,通过协同机制的构建,尽可能即时、广泛、准确地收集每一次“快闪”的相关信息,并将其与已经开展的“快闪”活动进行比对,以便预判由这些主体组织参与的“快闪”的内容、形式轨迹,进而实现有效监测。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对于白名单内的“快闪”活动,给予鼓励、支持和引导;对于纳入黑名单的,着重加强监测及教育,甚至可以在前期就停止实施。

构建“中国式快闪”的全员监管机制。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中国式快闪”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特别是主要来源于青年群体且服务于青年群体。因而“中国式快闪”监管问题的解决,一定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紧紧依靠青年群体,建立起全员参与的监管机制。通过对青年群体正确的价值引领和宣传教育,让其主动参与到“中国式快闪”的监测中,主动发现、主动报告、主动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实现参与主体层面的自我治理。可以说,对于“中国式快闪”,在组织参与上人人都可以“快闪”,要“快速出击”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监管的全员监管机制,用制度的力量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式快闪”的良性发展与行稳致远。

#### [ 参 考 文 献 ]

- [1]倪邦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4日。
- [2]王坤庆《人性、主体性与主体教育》,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 [4]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1日。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 [6]李玲玲《快闪文化现象的中国化初探》,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
- [7]陶建钟《“都市快闪”:游戏还是责任》,载《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4期。
- [8]周莹《爱国主义视域下爱国主题快闪活动论析》,载《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 [10]《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
-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2017年版,第323页。
- [12]《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18日。
- [13][1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7页。
- [14]高媛《“快闪”: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刘彦)